

抗戰時期央圖留港遭日劫掠古籍尋獲過程之探討

The Recovery of Rare Books Purchased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by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黃文德 Wen-De Huang

國家圖書館編輯

Editor,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Email: wende@ncl.edu.tw

唐申蓉 Shen-Jung Tang

國家圖書館助理編輯

Assistant Editor,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Email: tang@ncl.edu.tw

陳麗玲 Li-Ling Chen

國家圖書館助理編輯

Assistant Editor,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Email: liling@ncl.edu.tw

【摘要 Abstract】

有關探討國立中央圖書館在戰時購藏古籍歷史，特別是戰時央圖暫存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遭日軍掠奪之古籍，以及戰後歸還問題，相關研究多以當事者蔣復璁館長所稱，係由他委託我國駐日軍事代表團代為訪查被日本劫運去的善本書，然後被代表團成員上海市教育局局長顧毓琇在日本帝國圖書館找到，再經與日方洽商後收回，陸續運回南京。

本文認為，以顧氏尋獲央圖善本的說法並不正確。為了瞭解央圖留港古籍遭日劫掠圖書尋獲過程，本文將透過相關文獻分析與史料爬梳，釐清 11 種不同的說法，探討相關研究之觀點來源，藉由敘事研究取向，探討各方說法的遞變過程，以期獲得這些被研究者建構出來的尋寶者們是如何加入或者被附會為 1946 年尋獲央圖流落日本境內古籍的貢獻者。最後，本文彙整各方所提出之探索央圖善本下落，分析現象與人際關係資源運用，認為真正引導代表團、外交部派駐港澳官員訪得善本者，應屬當時

參與遠東委員會之英軍博薩爾少校與隸屬香港軍政府軍事法庭之調查官端納少尉之貢獻。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epublic of China) purchased a collection of rare books. Some of these books were then temporarily deposi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 Fung Ping Shan Library. In 1942, they were discovered and removed by Japanese troops, but after the war were eventually traced to Japan and recovered. Scholars researching how these books were found all cite a statement by the then Director-General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ang Fu-tsung. He once stated that he asked the Chinese Mission in Japan to search for the books, which were finally tracked down and recovered from the Imperial Library by Ku Yu-hsiu, Director of the Shanghai Education Bureau.

As far as the author can ascertain, there are currently at least eleven different explanations for how these books were found and recovered.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in these account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key figures in discovering the whereabouts of the books were in fact two British officers: Charles Ralph Boxer and H. G. Donald.

【關鍵詞 Keywords】

國立中央圖書館、陳君葆、蔣復璁、博薩爾、楊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an Kwan-Po; Chiang Fu-tsung; Charles Ralph Boxer; Yang Yun

一、前言

近年來有關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年更名為國家圖書館，英文仍為National Central Library）在抗戰時期前後之館史研究，早期僅有臺灣學者於圖書館界發表相關論文，今隨著冷戰時期結束，歷史意識形態改變，與檔案文獻資料之解密開放，此議題逐漸成為近代圖書館發展史的重要一環，如館舍播遷、國際交換、搶救

古籍、書刊管制、戰後接收、追索日本掠奪圖書文物、文物運臺等議題，蔚然成為圖書資訊與文史研究跨領域之重要議題。

有鑑於研究館史對於描繪近代東亞圖書館發展的重要性，國家圖書館館員組成館史研究群近六年來已進行包括〈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抗戰初期書刊國際交換〉（黃文德，2016），「抗戰前後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務經營與播遷相關史蹟調查—以南京、重慶為例」（2015），以及集體撰寫之「胡適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之關係」（2014）、「圖書館事業百年史：以國家圖書館為中心探討國立圖書館變遷與發展之意義」（2010）。在以上研究計畫，幾乎所有涉及戰時購藏古籍論述都會觸及 1941 年底日軍侵略香港後，掠奪央圖暫存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Fung Ping Sh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之古籍，以及戰後歸還之問題。對於這段歷史，曾經先後擔任央圖籌備處主任與館長的蔣復璁（1898-1990）首度公開提到：

委託我國駐日軍事代表團代為訪查被日本劫運去的善本書，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這批書籍被我代表團的顧毓琇先生在日本帝國圖書館找到，經與日方洽商後收回，先後陸續運回南京，失而復得，彌足珍貴（蔣復璁，1979）。

關於這段歷史，蔣氏在 1984 至 1985 年接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訪問時，說得更為詳細：

民國 29 年，我（蔣復璁）化名蔣明叔從香港潛赴上海，與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密商，主持收購善本事宜。在上海蒐購時，我本來預備將這些善本書送交香港馮平山圖書館，在那邊成立辦事處，裝好箱，轉交美國國會圖書館，勝利後再搬回來。但奉教育部之命必須於每一書內蓋章，費時 3 個月，誤了好幾班船，後來香港淪陷，這批書就被日本人搬走存放東京帝國圖書館。抗戰勝利之後，顧一樵先生前往參觀，因為圖章的關係，認出其中一批係中央圖書館之藏書，於是再將之運回南京，居然一本不缺。目前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室有洋鐵版的書箱就是當時的裝箱（蔣復璁、黃克武，2000）。

兩段敘述大抵闡述蔣氏認為顧毓琇（字一樵，1902-2002）1946 年 2 月 25 日在參觀東京帝國圖書館之餘不僅尋獲央圖書籍，也是將書籍運回中國的關鍵人物。此一觀點後來為國家圖書館 2003 年出版之《國家圖書館七十年記事》、2010 年出版之《國

家圖書館七十七年大事記》所收。惟細究蔣氏的說法，其實有不少可疑之處，首先是顧毓琇是否在赴日之前，即已接受委託尋找央圖古籍之下落？當時央圖在港圖書為方便日後識別，故以「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保存文獻之章」為藏印，但似乎未能於日軍入侵香港前將全部 111 箱書及用印處理完畢，故顧氏如果未曾接受委託，何以能識別出央圖古籍。再者，對於海外尋獲古籍，本為對國家重要貢獻，但從現存顧毓琇相關文獻，卻未見他敘述這件事。對於抗戰時期央圖留港遭日劫掠圖書究竟為何人尋獲、何單位所尋獲，隨著史料、回憶錄的開放，近年來諸家有不同引述。

本文認為，有關於歷史事件敘事探究 (narrative inquiry)，其內容係由敘事者或記錄者個人所處情境，伴隨文化經驗與時空背景之間的關聯互動而被建構出來。為了瞭解央圖留港古籍遭日劫掠圖書尋獲過程，本文透過相關文獻分析與史料爬梳，釐清相關研究之觀點來源，藉由敘事研究取向 (narrative approaches)，探討各方說法的遞變過程，以期獲得這些被研究者建構出來的尋寶者們 (treasure hunters) 是如何加入或者被附會為 1946 年尋獲央圖流落日本境內古籍的貢獻者。最後，本文依據檔案資訊比對，認為真正尋獲中國政府有關央圖古籍下落之人應為英國漢學家博克薩 (Charles Ralph Boxer, 1904-2000)，而中華民國政府官員首度在日本發現帝國圖書館展覽央圖漢籍者為 1946 年 2 月 23 日抵日之外交部東亞司長兼駐日軍事代表團副團長楊雲 (1901-1967)。至於這批圖書數量、清單，如何自日本運返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日後將另外撰文討論。

二、1941 年底以後央圖留港遭日劫掠圖書之過程

1937 年 8 月 15 日，日機空襲南京後，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 (以下簡稱央圖或央圖籌備處) 將重要圖書封存 262 箱，運送南京朝天宮之故宮博物院庫房。至 11 月 18 日，央圖奉教育部令自行規劃西遷後，又於這批圖書中提取重要西文與善本圖書 130 箱，運送南京下關貨輪碼頭，啟程往長江上游疏散。11 月 23 日，央圖圖書運抵武昌，暫寄存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至於留在南京之財產、圖書與古籍雕版則全部遭日軍有計畫性地破壞 (國立中央圖書館, 1947)。

由於當時日軍蓄意摧殘中國高等教育與研究資源，企圖整個消滅中國文化機構，使之無書籍可讀、無材料可資研究，如位於上海之中華書局與世界書局，在戰爭初期悉數遭日軍劫掠，使得戰時勉強開辦之各級學校竟無書可用（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1939）。另一方面，歐美重要學術機構如哈佛大學等，在中國對日抗戰時期也大肆蒐購流落書肆之古籍，造成文物大量流出中土，如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東方部首任主任恆慕義（Arthur William Hummel Sr., 1884-1975）在 1940 年底即奉命到華北地區進行購書（Kennedy, Robins-Mowry & Hummel, 1994）。

由於各國掠奪中華文物日益嚴重，國民政府為解決文物流落海外的迫切問題，就古籍文獻方面，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Returned British Boxer Indemnity Commission，以下簡稱中英庚款董事會）的支持下，央圖籌備處蔣復璁主任乃與學者鄭振鐸（1898-1958）等人於 1940 年至 1941 年期間秘密籌組「文獻保存同志會」，¹ 進行大規模古籍蒐購與搶救行動，最後共購得古籍 4,864 部，合計 4 萬 8 千多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2013）。由於行動多在日本控制之淪陷區進行，為避免成果為日本所奪，央圖曾將所購古籍精粹透過上海、香港等地，以海空接力方式輾轉送至重慶，但僅成功完成一次。後來因考量運送程序複雜、郵資不斐，香港寄送重慶之郵資價格竟高於寄送至美國，故空運郵寄古籍之數量包裹數始終無法採取大量以及集中策略。最後，經中英庚款董事會葉恭綽（1881-1968）聯繫香港大學陳君葆（1898-1982）協助，已到香港之 111 箱善本古籍，加上委託李寶棠帶至香港之 2 箱，均存放於馮平山圖書館（盧錦堂，2003）。

為了保護購藏古籍之安全，蔣復璁主任一度與中國駐美大使胡適（1891-1962）聯繫，胡適建議仿效國立北平圖書館等單位將文物運送到美國之案例，由之江大學（Hangchow University）職員利用返回美國之便，將古籍運送到中華民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蔣復璁，1941）。1941 年 10 月，經蔣復璁、鄭振鐸商議，鄭氏認為古籍疏散當以「運美為最上策」（鄭振鐸，1941）。於是，經由胡適與美國駐華使館、美國國會圖書館交涉，暫放馮平山圖書館的央圖購藏古籍赴美案遂拍板定案。最後，運美古籍訂於 12 月 6 日由美國輪船格蘭特總統號（President Grant）載運離開香港（盧錦堂，2003）。

¹ 其他參與之重要人士還包括葉恭綽、徐鴻寶、張壽鏞、何炳松、張元濟，以及張鳳舉。

1941年12月8日，日本襲擊美國珍珠港（Pearl Harbor），同日進攻香港。英國殖民地香港政府為了阻止日軍登陸，與華人合力展開城市保衛戰，但孤掌難鳴。12月25日以後，日軍完全控制局面，封鎖香港島對外交通，展開恐怖軍事統治，同時接管香港大學校舍，掠奪重要圖書儀器。港大陳君葆與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重慶央圖等，因戰爭而無法與對方取得聯繫，對於格蘭特總統號是否已將書籍載運上船，航行是否安全等問題，無法聯繫；而圍城之外的重慶央圖、中英庚款董事會、中國駐美大使館等三方面也無其他管道探得消息，於是央圖原暫存馮平山圖書館善本下落成謎。

三、提供央圖在港遭掠古籍下落的貢獻者與消息來源

央圖寄存港大古籍是否已在格蘭特總統號船上？根據現存紀錄這艘名義上屬美國美國總統輪船公司（American President Lines），排水量1萬496噸，原名亞當總統號輪船（President Adams）1939年後為美國海軍所徵用，負責太平洋航線。在1941年11月9日自檀香山出發後，並未停留香港，而是直接駛往馬尼拉，12月6日抵達當地。越2日，日軍轟炸馬尼拉，美軍機艦與人員損失慘重，故格蘭特總統號在11日便奉命拋棄所有與軍事任務無關之旅客、物資駛往澳洲達爾文港（Darwin），這些旅客後來多淪為日軍俘虜（Pacific Wrecks, 2017）。

既然格蘭特總統號未停靠香港，那麼在12月8日，日軍登陸香港時，央圖存港古籍理應存放在馮平山圖書館。主持運送任務的陳君葆追憶這段往事時，表示古籍的確原本要搭上格蘭特總統號，但因船班臨時變更，故未能裝運上船（陳君葆，2004）。由於港大為香港重要文教機構，而圖書館更匯聚重要文獻，故自香港淪陷後第5天即12月30日，日軍就已在圖書館發現這批古籍（盧錦堂，2003）。1942年1月10日起，陳氏的住所與辦公處更不斷被搜查，從2月9日以後還一度被要求待在香港花旗銀行大樓（City Bank of New York Building）看守圖書文物（陳君葆，2004）。未久隸屬日軍第23軍司令部的調查班宮本博少校正式到馮平山圖書館要求挑選重要圖書運載到日本（Wan, 2006），3月22日該館便被迫移交全館予日軍香港總督部調查班管轄（陳君葆，2004）。自此央圖古籍是否仍留在香港或者為日軍移往該國，亦不得而知。

根據鞞谷純一的研究，1942年初在馮平山圖書館進行掠奪圖書的調查班成員，包括宮本博少校、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之華僑問題專家須山卓、伊斯蘭研究學者前嶋信次、調查局圖書館大瀧榮一等人。他們率隊所掠奪之書籍除該館圖書外，亦包括央圖、北平圖書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嶺南大學之重要寄存圖書、古籍。而這批書共計 200 箱 4 萬冊，在同年 11 月 26 日由陸軍省以戰利品為名，交由軍方運交文部省，12 月 1 日，由帝國圖書館進行清點（鞞谷純一，2011）。當時負責此任務的帝國圖書館主要為館員岡田温，以及漢學家長澤規矩也（1902-1980）。1943 年 1 月，帝國圖書館開始整理與編目，至同年 7 月完成。為展示成果，該館於 8 月 11 至 12 日曾邀請專家學者 30 名閱覽。未久，隨著美軍 B-29 轟炸機大規模空襲東京，帝國圖書館奉命將部分央圖書籍隨其他貴重圖書疏散到日本鄉間（岡田温，1965）。

1941 年底央圖古籍運美移存行動，因日軍入侵而功虧一簣，但中英庚款董事會與央圖仍試圖探詢任何可能尋回古籍的線索。1942 年 8 月 8 日，央圖收到中英庚款董事會杭立武（1903-1991）的來信轉述陳寅恪（1890-1969）於 6 月 20 日來信通知，央圖所購善本書已多為日本「波部隊」運至東京（蔣復璁，1942）。陳寅恪係於 1941 年受香港大學聘為中文系客座教授接替病逝的許地山教授擔任教職。1941 年底香港陷落後，他與陳君葆，以及負責將收存圖書造冊撰寫清單的文學院馬季明教授（1883-1959）保持密切關係。香港陷落後，陳寅恪困居當地，生活十分艱困。為照顧家人，5 月 1 日，陳寅恪向陳君葆表示「數年來託命之所，今生恐無重見之緣」，遂在後者協助下，自香港脫困北返桂林（陳君葆，2004）。陳寅恪傳達內容不過寥寥數語，雖清楚說明書籍已在日軍手中，而非格蘭特總統號輪船上，但對於尋回書籍下落，並未有太大幫助。日軍「波部隊」即為當年負責廣東與香港軍事行動的「中國派遣軍第 23 軍部隊」之別稱，宮本博少校即隸屬該部隊，而該部隊實際在香港作戰之單位為第 38 師團，不僅所轄範圍遼闊，行蹤不定，要打聽人員動態，並不容易。相較於軍事作戰，有關戰時存港古籍下落並非中國對日抗戰情報工作的重點，因此直到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為止，重慶央圖方面便無其他線索。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正式向同盟國（Allied Powers）宣布無條件投降，同年 9 月 16 日，英國政府正式接受香港日軍投降。而經濟民生凋敝的國民政府對於戰時文物歸還問題，除將 1945 年 3 月成立之「戰區文物保管委員會」於同年 10 月 1 日更名為「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負責交涉文物的索還。另外，該會張鳳舉也提出了〈日本應歸還及應抵償我國文物損失之文物簡表〉（張力，2013），但裡面並未

列出日本確切應歸還央圖古籍數量。如果依照蔣復璁的說法同年 9 月他從上海與南京返回後，就已先委託駐日軍事代表團代為訪查，所以後來顧毓琇（1902-2002）以上海教育局長身分出使日本任駐日軍事代表團，便順利尋得古籍。然而，對照中華民國戰後駐日機構成立時間，蔣氏的記憶應有誤。二戰結束初期，中華民國駐日單位最初僅有「中國駐盟軍總部軍事連絡官辦事處」，該處最初任務為負責敵俘與僑民遣送作業（楊子震，2009），文物調查並非重要任務。另外，如果蔣氏有意透過人際關係在日本搜尋失落古籍，也應該是託付予「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成立後，外交部最早選派到東京之李濟（1896-1979）、徐森玉（1881-1971）、張鳳舉（1895-1986）、朱家濟（1902-1969）等 4 人所組成赴日調查團（張力，2013）。其中徐森玉、張鳳舉更曾是戰時文獻保存同志會重要成員，他們對於識別央圖購藏古籍，應較顧毓琇要來的高明，何以遭蔣復璁排除在外。有關戰後各界對於何人提供央圖掠奪書籍下落的線索，至今各方說法不一，以下謹就各觀點來源，進行整理如下表。

表 1

有關戰後各界說明央圖寄存馮平山圖書館遭劫掠古籍下落之敘述

時 間	消息來源	對於尋獲古籍下落的描述	資料出處
1945 年 9 月	蔣復璁委託中華民國駐日軍事代表團協尋，顧毓琇受託	央圖蔣復璁館長曾表示 1945 年 9 月返回上海與南京後曾委託駐日軍事代表團代為訪查；後來顧毓琇（1902-2002）在日本帝國圖書館找到。	（蔣復璁，1979）
1945 年 11 月 18 日	陳君葆	11 月 18 日，重獲行動自由的陳君葆分別寫信向中英庚款董事會杭立武與央圖蔣復璁館長說明 111 箱古籍被挪出港大經過，並補充當地尚有 520 冊各館存港古籍仍在館內。但遭日軍掠奪書籍存放之地點，以及何人可負責接洽索回，陳君葆並未能自日方獲得更多訊息轉提供給重慶方面。	（陳君葆，2004）
1946 年 1 月 24 至 25 日	日人樂滿與江村、竹籐	陳君葆與英軍端納上尉到赤柱軍事監獄提審日人樂滿與江村，他們對於圖書事均閃爍其詞，樂滿說他 1945 年 1 月才到港，故以前事不知；並將責任推給神田（喜一郎）與島田（謹二）兩人身上。江村則說曾聽其部長謂書仍留在香港未運走。竹籐峰治則完全拒絕透露。	（陳君葆，2004）

（續下頁）

表 1 (續)

時 間	消息來源	對於尋獲古籍下落的描述	資料出處
1946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1 日	陳君葆友人博薩爾	1946 年陳君葆友人博薩爾隨遠東委員會 (Far Eastern Commission) 到日本審查日本戰爭罪行，博薩爾給陳氏另一位友人馬提太太的信中，說他在東京上野公園發現 111 箱書籍；博薩爾並立即向在東京的中國使館報告。	(陳君葆，2004) 當時中國駐日本並未設置大使館，應為誤植。
1946 年 1 月	袁同禮及其香港友人	袁同禮在提供給教育部的說法：根據「香港友人」的說法，央圖原寄存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的善本圖書，原擬暫存寄送到美國的古籍，因故中止。1942 年 2 月期間為日本竹籐峰治帶領日軍調查班宮本博少佐、肥田木近中尉將此批圖書強行劫掠，並以東京參謀本部封條。當時友人以為書籍均已運往東京，惟實際上日軍因運輸困難，或可能運到臺灣。	(教育部，1946a)
1946 年 2 月中	教育部、外交部、軍令部	1945 年底至 1946 年初，教育部、外交部、軍令部等單位在香港、臺、日三地調查。1946 年 2 月中，有人在東京上野公園帝國圖書館發現所藏永樂大典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印記，繼而又陸續在其他書上發現除同樣印記外，還有嘉業堂藏書印。	(盧錦堂，2003、2013)、(蘇精，1979)
1946 年 2 月 23 日	外交部 楊雲 (1901-1967)	外交部亞東司等通知教育部，該司司長兼駐日軍事代表團副團長楊雲 (1901-1967) 於赴日東京參加同盟國遠東委員會考察時，發現央圖存香港之《四庫全書》遭日軍劫掠約三萬冊，現存東京上野(帝國)圖書館。	(朱世明、楊雲，1946) *實際上央圖當時並無購藏《四庫全書》。
1946 年 2 月 25 日	顧毓琇	1. 顧毓琇前往日本帝國圖書館參觀，認出央圖藏書章，於是將書運回南京，一本不缺。 2. 顧毓琇作為中國政府的代表，通過盟軍總部從日本取得一批科研設備運回國內，他認為中國也應該研究原子能科學。在參觀東京帝國圖書館時，竟發現有幾箱善本書是由南京中央圖書館劫掠去的，即向日方索回。	(蔣復璁、黃克武，2000)、 (顧毓琇紀念館，2017) *有關顧毓琇抵日本日期一說在 2 月 25 日，另一說在 3 月。

(續下頁)

表 1 (續)

時 間	消息來源	對於尋獲古籍下落的描述	資料出處
約 1946 年 3 月至 12 月	李濟與王世襄等有關人員	李濟係 1946 年 3 月抵達日本東京。 王世襄係 1946 年 12 月中旬抵達日本東京。 上海大學陳文平教授訪問王世襄 (1914-2009) 時，整理王氏談話，認為李濟與他等有關人員抵達日本後多方尋覓，參觀日本公私博物館及文化機構，調查被劫文物，順利追回中央圖書館暫存馮平山圖書館之善本古籍。	(陳文平, 2015)
1946 年 3 月 9 日	英國海軍端納上尉、公署香港辦事處特派員郭華德	經外交部駐廣東廣西特派員公署香港辦事處特派員郭華德的聯繫，取得端納調查報告。端納判斷古籍已被運往日本東京帝國圖書館，並在戰爭期間運往鄉下疏散。	(郭華德, 1946a)
1946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6 日	張鳳舉	自 1946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6 日期間，張氏至東京次日與美軍首談歸還日軍自香港掠來中央圖書館善本 130 箱書與其他文物事。4 月 8 日帝國圖書館目睹該善本書。6 月 1 日 13 萬 5 千餘冊歸還代表團處。	(張鳳舉, 1946)

四、戰後尋訪在日央圖古籍下落的謬誤與真相

從上節本文所整理之 11 種有關各方對於尋獲古籍下落的描述可知，當時央圖古籍在 1946 年 1 至 3 月已確認仍存放於日本。1946 年 3 月中國派駐東京之「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團」正式設立，同年 6 月該團擴大編制，改稱「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除負責對盟國委會之交涉工作外，並籌辦索取賠償及索還中國被日方所劫奪物資之歸還與求償。其中該團所設第三組，專責經濟、賠償、索還被劫物資。對日文物歸還處理，才逐步上軌道，但目前未發現在 1946 年 2 月初以前，任何有關央圖或蔣復璁往來聯繫駐日單位之書信函稿。

戰後同盟國追討遭軸心國掠奪文物，各國皆然，而職掌戰時文獻、文物財產本為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之責，因此該委員主任，曾擔任中英庚款董事會的杭立武在 1945 年 12 月下旬曾透過外交部探詢盟軍駐日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 (General Headquarters, 以下簡稱 GHQ) 有關派員前往調查中國戰時遭日本劫掠

文獻與文物之計畫是否可行。由於美國所掌握的 GHQ 不允許日本政府與外國政府直接交涉。故 GHQ 婉拒中國等盟國派遣人員赴日進行調查，但表示歡迎中國派遣專家，以個別身分加入隸屬 GHQ 總務聯絡員之工作。GHQ 的答案顯然暗示調查行動須受到其管制，故中國政府並未接受。為了強化在法理上取得對日索回遭劫掠文物的所有權，外交部乃請教育部提報文物專家名單，1946 年 3 月 6 日政府正式聘請李濟之、張鳳舉、徐鴻寶為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以利文物調查工作。

為了尋訪同樣在 1942 年初寄存於馮平山圖書館遭日軍劫掠的古籍下落，國立北平圖書館袁同禮館長（1895-1965）也積極進行調查。在前述表 1 袁同禮提供的線索中，所謂「香港友人」，應為與他素有深交的香港大學陳君葆。從陳氏日記可知他在 1942 年日本軍進入香港統治就已掌握日軍調查班宮本博少佐、肥田木近中尉將此批圖書強行劫掠；陳氏對於包括央圖、平圖在內之寄存香港大學圖書極為關切，故當他在 1945 年 8 月香港脫離日本統治後，即奔走香港各地戰時存放圖書位置清點，並於 1946 年 1 月 24 至 25 日與英國軍政府軍事法庭端納少尉（H. G. Donald）² 及三名軍官到赤柱監獄，提審日本香港總督部民政部首腦 Rakuman Kinji（日文姓名不詳）³ 與江村氏、竹籐峯治，但如前所述樂滿（日文姓名不詳，英文為 Rakuman Kinji）表示他在 1945 年 1 月才到香港，對於過去毫不知情，並將所有劫掠一事推給負責戰時香港圖書館的學者出身之官員神田喜一郎（1897-1984）與島田謹二（1901-1933）以及竹籐峰治。三人之中唯竹籐峰治否認指控，其餘二人則表明不知圖書下落（陳君葆，2004）。

來自陳君葆的線索，對於教育部、央圖可以說是相當重要。由於 GHQ 主張依國際法原則處理掠奪品歸還問題，有關日本返還盟國圖書文物或取得戰利品，都必須在嚴格的監督下進行（岡田溫，1965）。1946 年 1 月 8 日，外交部發函教育部告知 GHQ 曾於 1945 年 10 月 12 日起規定：「凡往來日本具有歷史文化及美術價值之進出口品，不論來自何地均予以禁止，不論其所有人為何，將給予完全保護」。中國政府如要取回日本於戰爭期間掠奪中國之戰利品，必須要有更明確的證據。因此，教育部乃在 1946 年 1 月 31 日，以「攸關國家文獻」為由，迅速發函外交部要求協助調查央圖古籍下落，並追查宮本博、肥田木近，以及請外交部轉請香港軍政府提審竹籐峰治，以

² 陳君葆日記中所載端納並無英文姓名，職銜也誤植為上尉。

³ 日文原名不詳，其職位為日本佔領香港總督部民政部首腦。

查出此書存放地點（教育部，1946b）。另外央圖也在 2 月 18 日另外發函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要求協助同樣事宜（國立中央圖書館，1946）。另一方面，由於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啟動調查。經各方積極處理，本案在 1946 年初很快就獲得中華民國政府派駐香港與日本之外交單位回應：

- （一）1 月 23 日，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主任杭立武，向外交部推舉曾留學日、法，並參與文獻保存同志會之前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加上嫻熟英語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前往日本調查對日文物資產求償。至 3 月 6 日，復加派徐鴻寶為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以利文物調查工作。
- （二）2 月 23 日，外交部亞東司等通知教育部，中央圖書館寄存香港之《四庫全書》約三萬冊現存東京上野圖書館。該司司長兼駐日軍事代表團副團長楊雲（1901-1967）於赴日東京參加同盟國遠東委員會（Far Eastern Commission）考察時，發現央圖存香港之《四庫全書》遭日軍劫掠約三萬冊，現存東京上野（帝國）圖書館。經赴該館訪查約三萬冊，一部分業經該館整理編目，一部分為避免轟炸轉往外地，經交涉約 3 月初運回（朱世明、楊雲，1946）。
- （三）3 月 9 日，經外交部駐廣東廣西特派員公署香港辦事處特派員郭華德的聯繫，取得之前與陳君葆提審竹籐峰治等人的英國端納個人在 2 月 22 日所撰寫調查報告。端納在提審前後三星期曾尋訪書籍下落，該批 101 箱已確信被運往日本東京帝國圖書館，並在戰爭期間運往鄉下疏散。（郭華德，1946a）郭氏與端納持續聯繫直到同年 6 月，書籍「全部尋獲」為止。郭氏為感念端納「以一人之力，窮半載之工，尋回關係我國家之善本」，建議政府頒給獎勵章狀（郭華德，1946b）。
- （四）3 月 14 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駐東京聯絡參謀唐啟琨報告 130 箱計 3 萬餘冊圖書已於帝國圖書館尋獲，經交涉已允歸還，待編目錄後交上海教育局長顧毓琇及外交部劉增華專員設法運回（教育部，1946c）。
- （五）3 月 15 日，外交部派駐日盟軍最高統帥部聯絡參謀辦事處專員劉增華呈外交部表示，日人竹籐峯治等人劫掠香港馮平山圖書館善本，經詳加密察，已在上野公園帝國圖書館查得該館保管約 25,000 冊，因空襲疏散到伊勢原者約 1 萬冊，亦經該館圖書館員岡田溫所承認（外交部，1946）。

從各方回應之訊息，約略可知外交單位最初未必知道央圖遭掠書籍之內容，因此才出現所謂央圖存香港之《四庫全書》遭日軍劫掠約三萬冊之誤報。實際上，本案與《四庫全書》並無任何關連。

除了中華民國政府極力透過各種管道搜尋，陳君葆在香港相識之友人博薩爾，他在陳氏日記曾被以至少三種姓名稱呼，如博沙或博。此人真正身分為 Charles Ralph Boxer，香港著名英國歷史學者、漢學家與古籍藏書家；他出身軍人世家，1941 年香港保衛戰時，曾因傷為日軍所俘虜，直到 1945 年都在戰俘營（POW），而其藏書也遭日軍劫掠。1946 年 2 月，博薩爾以少校身分參與英國派駐日本遠東委員會工作直到 1947 年。他在給陳君葆另一友人的信中提到，為了找回自己的書，在東京發現自己藏書千餘冊，經立即交涉後移到英國大使館，然後隨他在 2 月初返回美國⁴。除了他自己的書，還曾在東京上野公園帝國圖書館發現央圖 111 箱書籍，博薩爾立即向在東京的中國使館報告，並把陳君葆對這件事看法紀述告訴中國官員（陳君葆，2004）。陳君葆知道博薩爾發現央圖古籍消息時，已經是 1946 年 6 月 16 日，而他推測博薩爾找到書籍的時間約在 1 月中至 20 日左右的時間，也就是博薩爾抵達日本的初期⁵（Alden, 2000）。

如果陳君葆日記與博薩爾取回書籍之事實一致，那麼中國政府派駐東京相關官員，如外交部楊雲等人在 2 月下旬抵日時應該就已經知道上野帝國圖書館存放央圖古籍，而外交部專員劉增華則確認端納所提供空襲疏散到伊勢原之位置。因此，無論是 2 月 25 日才到東京參觀展覽的顧毓琇，或者稍晚到日本的張鳳舉、李濟之、王世襄等人，其所得消息已經都晚於駐日單位。換言之，他們到日本只是確認書籍身分與交涉文物回到中國之運送過程。

既然中國官方明知古籍已由博薩爾發現，但為何蔣復璁後來每談這段歷史，皆以顧毓琇為尋獲古籍之關鍵人物。有關這一點，張錦郎在〈抗戰時期搶救陷區古籍諸說述評〉認為顧毓琇搭乘美國軍用機飛抵東京，「總要先拜會大使館，大使館應會說這批書已找到了。參觀還是可以去參觀，以便回國報告說看過這一批書」（張錦郎，2013）。當時中華民國在日本並無大使館，先參觀，然後發現央圖古籍在日本帝國圖書館，此發現文物模式幾乎與博薩爾所述相同。對央圖而言，顧毓琇在 1940 年擔任教育部次長時極力推動支持中英庚款基金董事會撥款提供央圖搶救古籍，甚且影響陳立夫部長欣然同意，故表示「在經費方面，願全力支持」（張錦郎，2009），以彰顯政府護持中文古籍淵源甚深，故如由外國人士發現古籍，或者公開宣布由顧毓琇

⁴ 博薩爾的藏書後來捐贈予美國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 分校圖書館。

⁵ 有關博薩爾抵日時間 Dauril Alden 也是主張 1946 年 1 月初。

在日本尋回這批古籍，其意義自然更顯重大。因此，在館史記載敘事中，顧毓琇前往日本帝國圖書館參觀，認出央圖藏書章，於是將書運回南京，一本不缺，遂成為官方說法。

顧毓琇不僅與蔣復璁關係密切，3月31日亦抵日本的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朱世明（1898-1965）更與他是清華大學前後期同學。朱氏為1922年畢業生，而顧氏則為1923年畢業，與8月16日抵東京之吳文藻亦為清華大學同班。倘若代表團內部有意塑造顧氏尋獲善本之功，亦不無可能。但無論是蔣復璁或者代表團內部如何力捧顧氏，總有旁觀者另有說法，如當年參與圖書歸還業務的王世襄，曾在其回憶錄提及許廷長所撰〈民國時期的中央圖書館〉一文中，述及這段圖書歸還過程，係因顧毓琇參觀帝國圖書館地下室及伊勢原鄉下所發現，後與美軍協商，始全部運返南京（王世襄，2007）。對此說法王氏顯然並不認同，而另引介讀者參閱自己所撰《王世襄自選集—錦灰不成堆》，言明是個人在1946年12月下旬到日本所見，當時央圖古籍除10箱在代表團外，另外107箱仍由日本文部省保管，以此直接駁斥是顧氏發現古籍並運返之說法（王世襄，2007）。但王氏對於這批文獻究竟是由誰尋獲，在他所撰相關論著中，並未加以描述。

五、結語

有關抗戰時期央圖滯留香港馮平山圖書館善本古籍遭日本劫掠之歷史，歷來多以1946年2月顧毓琇訪日參觀尋獲作為敘事之核心，包括1980年蔣復璁撰寫具回憶錄性質的《我與中央圖書館》一文，或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蔣復璁進行之口述訪談，大抵構成日後相關論述的基本材料。然而，隨著陳君葆日記與1990年代以後王世襄回憶錄，以及國史館、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開放，所謂顧毓琇訪日參觀尋獲一說，已非定論。

透過各方材料的比對，本研究發現相關線索仍出自於香港本地，即馮平山圖書館主任陳君葆、英軍少尉調查官端納、英軍少校博薩爾等人棄而不捨，從戰爭結束後就積極追蹤，並在相當程度上與中華民國政府外交機構，包括外交部駐廣東廣西特派員公署香港辦事處、駐日代表團等單位保持聯繫；另一方面，駐日代表團、教育部所屬「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也多能利用前述三方所提供資訊，故終能在1946年2

月底以前就掌握上野公園帝國圖書館與疏散到伊勢原等地之古籍存放位置，6月底前尋獲所有圖書。如不考慮索還書籍所遭遇之盟軍內部協調問題，本案基本上已達到對日追討善本古籍之任務目標。

由於顧毓琇曾擔任教育部次長，他之於央圖蔣復璁館長爭取戰時搶救古籍之撥款支持有恩，而顧氏又與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南京蔣經國等政府要員關係密切，導至日後蔣復璁回憶這段歷史，竟將發現國家善本之功，形塑為顧毓琇一人獨力完成。實際上，央圖善本尋獲之功，則當歸於英人博薩爾少校與端納少尉提供線索，加上政府部分駐外官員，鏗而不捨，戮力從公。此一青史長流，不應掩沒於字紙堆置中。

參考文獻

- Alden, Dauril (2000). An enduring affair Charles R. Boxers fascination with Japan. *Bulletin of Portuguese - Japanese Studies*, 1, December, 2000, pp. 153-154.
- Kennedy, C. S., Robins-Mowry, D. & Hummel, A. W. (1994) . *Interview with Arthur W. Hummel Jr.* [Manuscript/Mixed Material] ,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US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oc.gov/item/mfdipbib000539/>
- Pacific Wrecks (2017). *President Grant* . Retrieved from http://www.pacificwrecks.com/s hips/usn/president_grant.html
- Wan, Y. C. (2006). Librarie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1–45. *Hong Kong Libra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73)4 · Retrieved from <http://hkla.org/newsletter /Sep06.pdf>
- 王世襄（2007）。*王世襄自選集—錦灰不成堆*。北京市：三聯書店。
- 朱世明、楊雲（1946）。致國立中央圖書館函，1946年2月23日，「要求日本歸還圖籍（一）劫物歸還」。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編號0200101190027），國史館，臺北市。
- 外交部（1946）。外交部代電教育部，1946年3月19日，「戰時圖書徵（集）購案」。外交部檔案（檔號020000038431A），國史館，臺北市。
- 岡田温（1965）。終戰前後の帝国図書館。*図書館雑誌*，59（8），276-277,279。
- 國立中央圖書館（1946）。致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函，1946年2月5日。館史文獻（編號A0059），國家圖書館，臺北市。
- 國立中央圖書館（1947）。國立中央圖書館概況。*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3），47-54。

-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 (2013)。《希古又文：1940-1941：搶救國家珍貴古籍八十種圖錄》。臺北市：國家圖書館。
- 張力 (2013)。《從戰時文物保護到戰後文物索還，1937-1950》。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計畫期末報告 (計畫編號：NSC 101-2410-H-001-067)，未出版。
- 張鳳舉 (1946)。張鳳舉日記，國家圖書館，臺北市。
- 張錦郎 (2009)。蔣復璁著《珍帚齋文集》補正。《佛教圖書館館刊》，50，66-91。
- 張錦郎 (2013)。抗戰時期搶救淪陷區古籍諸說述評。《佛教圖書館館刊》，57，54-116。
- 教育部 (1946 a)。《教育部函外交部，1946年1月31日》。館史文獻 (編號A0070-A0071)，國家圖書館，臺北市。
- 教育部 (1946 b)。《教育部函外交部，1946年1月31日》。館史文獻 (編號A0060)，國家圖書館，臺北市。
- 教育部 (1946 c)。《教育部轉函，1946年3月26日》。館史文獻 (編號A0072)，國家圖書館，臺北市。
- 許廷長 (1995)。民國時期的中央圖書館。《中國典籍與文化》，3，41-45。
- 郭華德 (1946a)。《外交部駐廣東廣西特派員公署香港辦事處電呈外交部辦理交涉中央圖書館所失書籍經由，1946年3月4日，「戰時圖書徵(集)購案」》。外交部檔案 (檔號 020000038431A)，國史館，臺北市。
- 郭華德 (1946b)。《外交部駐廣東廣西特派員公署香港辦事處電代電，1946年6月28日，「戰時圖書徵(集)購案」》。外交部檔案 (檔號 020000038431A)，國史館，臺北市。
- 陳文平 (2015年9月15日)。被日掠奪文物近 200 萬件珍品仍散落 索回幾乎無望。中國新聞網轉引《廣州日報》。2017年7月5日，檢自<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5/09-15/7523584.shtml>
- 陳君葆 (2004)。《陳君葆日記 卷2：1941-1949》。香港：商務印書館。
- 黃文德 (2016年8月)。《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抗戰初期書刊國際交換》。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論壇·第一屆中華民國史青年論壇。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 楊子震 (2009)。中國駐日代表團之研究—初探戰後中日·臺日關係之二元架構。《國史館館刊》，19，47-86。
- 鞆谷純一 (2011)。《日本軍接收図書—中国占領地で接收した図書の行方》。大阪市：大阪公立大学共同出版会。

- 蔣復璁（1941）。致文獻保存同志會（渝庚補第 892 號密件），〔發文時間約在 1941 年上半年〕。館史文獻（編號 A0362），國家圖書館，臺北市。
- 蔣復璁（1942 年 8 月 8 日）。函教育部。館史文獻（編號 A0036-A0037），國家圖書館，臺北市。
- 蔣復璁（1979）。我與中央圖書館。《近代中國》，11，162-170。
- 蔣復璁口述，黃克武編撰（2000）。蔣復璁口述回憶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鄭振鐸（1941）。鄭振鐸致蔣復璁，〔約 1941 年 10 月初〕。館史文獻（編號 0092-B0094），國家圖書館，臺北市。
- 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1939）。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徵書緣起。館史文獻（編號 061-016），國家圖書館，臺北市。
- 盧錦堂（2003）。抗戰時期香港方面暨馮平山圖書館參與國立中央圖書館搶救我國東南淪陷區善本古籍初探。《國家圖書館館刊》，92（2），125-146。
- 盧錦堂（2013）。劫餘玄覽幸遷來。在《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編，希古又文：1940-1941：搶救國家珍貴古籍八十種圖錄》（頁 27-29）。臺北市：國家圖書館。
- 蘇精（1979）。抗戰時秘密蒐購淪陷區古籍始末。《傳記文學》，35（5），109-114。
- 顧毓琇紀念館（2017）。年表檢自 <http://www.guyuxiu.cn/>

